

1 引论

本书的论题尽管涉及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但主要属于区域经济学的范畴。

1.1 论题及其界定

1.1.1 论题、假说及初步论证

本书的论题即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样，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可分为两种：平衡增长的方式和不平衡增长的方式。这里的不平衡增长，从动态看，是以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产业之间的非均衡增长；从静态看，是指主导产业占有足够大的比重。

本书试图证明：通过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安排（指不平衡增长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下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效益最大化。

本书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说之上：资源倾斜配置（含存量调整、增量倾斜、主导产业扶植等）→不平衡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经济高速增长和效益最大化。这一假说链条在未得到论证之前，我们假定它有内在的逻辑。本书的重点在于建立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体系。

这种假说能否成立，详细的论证由以后各章展开，我们先尝试作出初步论证：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生产的社会化程

度不断提高，商品流通打破了地区和部门的界线，这使得一个地区工业的不平衡安排成为可能。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对资源进行倾斜配置，可以实现不平衡增长。

不平衡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直接的、主导的力量。也许有人会说，技术进步才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主导力量。然而我认为，技术进步并非在所有产业里同步产生，一些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必然是一种高速增长的产业，随着该产业的高速增长，提高其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才导致了产业结构优化；即使我们暂时抛开技术因素，单纯从效益的角度看，那些效益好的产业由于市场扩张的牵动等原因而高速增长，从而产生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一些经济学家，诸如鲁宾逊、钱纳里、费德等，在新古典增长公式的基础上加入一个或更多的结构变量来研究经济增长，以统计分析来说明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果证明，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笔者在书中也建立了模型，以此验证不平衡增长通过结构优化产生经济增长和效益。

其实，不平衡增长不仅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经济增长和效益，而且也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例如，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主导产业的规模和增长速度。

投资增长一般会带来产出的增加，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固然是经济增长的必需条件，但当我们考察产出效益而不是产出速度时，如果结构不发生变化，投入的增加对产出效益的提高不会有多大帮助。投入的产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态。如果结构扭曲，且呈刚性，那么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将得不到合理配置，或严重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工业及辽宁工业近十多年来主要由于较高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而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效率却呈下滑的趋势，这可以在结构上找到原因。只有调整结构，使之实现高度化，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才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即使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是零增长，

结构的优化也会提高经济效益。这使得一个地区工业不平衡安排成为必要。

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中，产业结构合理演进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兴衰，决定着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实力的升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日本和英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严重不足的困难，她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挥了结构因素对增长的作用，从推动产业结构合乎规律的转换中求速度、求效益。相反，曾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却由于缺乏足够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时代。由此可以断言，一个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停留在原有的产业结构水平上，无论有多大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也很难有经济效益的较大幅度提高，即使经济增长有较高的速度，但由于低效益的制约也难以持久。所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首要目的的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安排，应该成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首选战略安排。

1.1.2 相关界定

本论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并与许多研究领域存在交叉，为了保证其严谨，必须进行取舍和界定。

首先界定研究范围。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其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一般可分为内部增长因素和外部增长因素。内部增长因素包括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结构因素，其中供给因素就是生产要素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一般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三个因素；需求因素包括消费和投资两方面，两者之和即为地区总需求；结构因素包括布局的区位调整（或称区位优势）、集聚经济（相关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产生的效益）、以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区域增长的外部因素包括区域间

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区间贸易。前者包括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技术知识扩散等。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有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收入的高低；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是不同地区之间资本收益的差异；技术知识的扩散则由高度发达地区向其它地区扩散，其速度往往取决于教育、通讯的改善和市场的完善程度。区间贸易的影响因素包括区间贸易障碍和区间需求。从经济学角度讲，区间贸易障碍指区间距离和区间运输成本，在实践中似乎还应包括贸易壁垒；区间需求决定着区域输出，区域输出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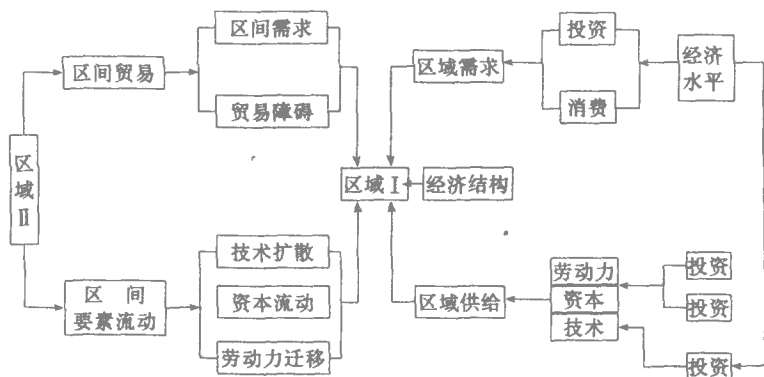


图 1-1 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

说明：该图引自张超、沈建法著《区域科学论》第 162 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年 9 月版。图中作了局部调整。

在上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庞杂因素中，本书研究范围局限于经济结构因素。即使在经济结构因素中，也舍弃其中布局的区位调整和集聚经济的研究，重点研究以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其次界定研究对象。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最后界定几个概念。

平衡增长：严格按照再生产过程的比例要求所安排的产业数目、产业比重以及产业间的速度比率。

区域、地区：在本书中具有相同含义，指某一具有相对集中统一的调控功能的地域空间。本书赋予的含义是省级（含直辖市）地域空间。从经济学角度似乎更应侧重经济区的研究，然而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经济区内的结构调整既缺乏强有力的市场力量，又缺乏相对集中统一的行政力量，而且也缺乏以经济区为范围的统计数字，故而放弃了以经济区作为研究对象。

本书的标题“区域内经济不平衡增长研究”原无“内”字，但原标题极易引起“区域间经济不平衡增长研究”的误解，故加一“内”字。在书中，则将内字省去。

产业：本书非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主要是指国家统计局在工业内部划分的 39 个行业。所谓不平衡增长，本书系指 39 个行业间的不均衡增长。当然也可以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对象来研究平衡增长或不平衡增长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研究工业内部行业间平衡或不平衡增长问题更有意义。

1.2 理论突破与应用价值

1.2.1 理论突破

从世界范围看，区域经济学的体系已趋于完善，理论亦趋于成熟。但研究对象或是一个国家，或是区域之间，而专门以区域为对象来研究增长方式，迄今尚不多见。

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既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是发展经

济学（增长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所谓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果。在发展经济学中，平衡增长战略和不平衡增长战略是对立的两大战略，在书中，则试图论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论证和验证从平衡增长到不平衡增长所产生的效率；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产业结构状态的度量缺乏指标和标准，本书试图建立这一指标和标准体系，以便为在实践中判断地区产业结构状态（指低平衡、高平衡、低不平衡、高不平衡）提供方法和依据。

1.2.2 应用价值

自新中国成立到 70 年代末期，是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在这一时期，省与省之间的分工以及省域内部产业结构的建立，主要遵循着“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从 1958 年提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经济体系以后，许多地区不顾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及自然条件的约束，盲目追求建立行业俱全的、独立完整的产业经济体系，这不仅使我们整个国家，也使各个省份都实施了平衡增长战略。由于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因而造成了资源上的巨大浪费。

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省级政府经济决策权力不断增大，都十分关注经济增长，都在制定增长（或发展）战略。在整个 80 年代，各省仍在追求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品的自给自足，例如重工业比重大的省份大力发展轻工业而轻工业比重大的省份大力发展重工业就是有力的证明。进入 90 年代，各省开始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寻找和建立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与过去相比，这是一种进步，一些省份找到了合适的发展方向，在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带领下，经济发展走上健康高速之路。也有一些省份的战略选择是荒不择路，全国有 20 多个省份选择汽车工业作为主导产业，这证明了一些省份的战略安排没有尊重科学和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仅仅是一种

利益驱动。总的说来，对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选择缺乏系统而坚实的理论指导，导致了实践中战略更替的频繁和政策的摇摆不定。本书试图建立起这一理论基础。

1.3 结构框架及研究方法

1.3.1 结构框架

本书力图使结构框架趋于简化，以突出中心论题。

第一章：引论。提出论题并作出相关界定。

第二章：基础理论阐释。介绍迄今为止的有关各个学派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各种著名理论，并对其中一些理论略作评析。该章的地位是作为论题的理论基础，并可从中看出本书论题与这些理论的相互关联性和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相对地位。

第三章：不平衡增长的基础理论。这是对论题的直接论证。首先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作质的界定，同时分别在动态和静态下对平衡与不平衡作量的区分；接下来论证不平衡增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前者指不平衡增长的客观趋势，后者主要指不平衡增长所产生的效应；最后论证不平衡增长的制约性，即不平衡增长的种种制约和限制，这恰恰是作为不平衡增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相互制约，构成了矛盾的统一性，使得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追求适度的不平衡增长。这一章是全书的核心。

第四章：不平衡增长的绩效分析。这一章是上一章的延伸，亦是对不平衡增长的必要性的进一步论证。这一章包括两节：理论和模拟的分析；实证分析。

第三章和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体系。

第五章：不平衡增长的决定因素。一个地区的不平衡增长战略的确定要分析许多因素，该章按照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选取了

供给、需求、竞争和地区分工 4 个因素，分析了它们在地区不平衡增长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并提供了必要的分析方法。

如果按照“资源倾斜配置→不平衡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经济高速增长和效益最大化”的逻辑顺序，似乎第五章与第六章应该安排在第二章的前面。笔者没有如此安排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突出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地位，二是在阐述不平衡增长理论之后，提供实现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与方法，这在逻辑和方法上都是说得通的。

第六章：不平衡增长的手段与方法。一个地区实现不平衡增长，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该章侧重于研究政府行为对不平衡增长的影响。其内容除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之外，还包括存量调整、资源倾斜配置、主导产业选择等内容。

1.3.2 研究方法

在区域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是经济学家的方法，另一类是地理学家的方法。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区域经济学问题研究中假设区域内部是均质的，从而把区域内部的差异抽象掉。这样做便于将宏观经济理论运用于区域分析中。这种方法要从某些参数变量的相互作用中预测区域经济活动的短期变动和长期变动。以这种方式研究区域经济，便于解剖区域发展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揭示出一个或一组变量发生变化时，对区域经济发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而地理学家侧重于对地区发展的实证性研究，认为空间—距离—可达性对地区发展具有先决性。本书主要采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

另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分析方法包括：理论分析与应用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此外，理论的抽象和论证是沿着从具体到一般再到具体的轨迹进行的。

2 基础理论阐释

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构成其理论框架的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或称增长）理论、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布局理论和工业区位理论。前两种理论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后来区域经济学家将其引伸到区域研究中。本章主要阐释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一般包括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平衡发展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推进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区域发展战略理论。本章有选择地作出阐释。

2.1 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区域平衡发展理论是从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引进并发展而形成的。这一理论主要包括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1.1 与平衡发展理论形成有关的三个理论

(1) 临界最小努力命题理论

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赖宾斯坦于 1957 年在《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的。赖宾斯坦认为，不发达经济中既存在着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力量，也存在着使人均收入下降的因素和力量。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的水平，提高人均

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么，就不能克服发展的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了使一国经济从落后状态向比较发达的状态转变，取得长期持续的增长，这国经济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赖宾斯坦的命题建立在这样一个经验证据上面，即人口增长率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一个函数。当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时，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此时可以假定人口增长率为零。一旦人均收入超过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在出生率不变或没有下降的情况下，死亡率首先下降，人口增长率提高。此时，增长的收入倾向于提高人口增长率。但当人均收入继续提高，超过一定点以后，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就下降，经济发展也就获得新的动力。由此可见，如果人均收入的增长不能达到临界点，也就是达不到使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水平，那么增加人均收入的努力会反过来降低人均收入水平，使经济发展过程又回复到最初的低水平均衡状态。

所谓“临界点”是指人均收入始终保持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均衡点。从长期看，发展中国家推动人均收入上升的刺激力量一般小于人均收入上升时形成的阻力（主要指人口增长率的上升），引起一个反复轮回的所谓“恶性循环”。所谓“临界最小努力”，即保持在临界点规模上的刺激力量，这种刺激力量来源于创办企业、增加知识存量、提高居民生产技巧、提高储蓄和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等活动。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从落后状态向比较发达的状态转换，经济所受的刺激必须大于“临界最小努力”，即必须有更多的企业家从事超越“临界点”的经济活动，同时投入更多的资源，才能促使经济高速增长。

（2）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该理论是由发展经济学家内尔森在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赖宾斯坦提出的“准安定均衡”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最终形成

的。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居民储蓄和投资率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的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拉回到低水平稳定均衡状态之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

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可动员经济资源（包括资本）不变和没有来自经济外部的刺激（即外力助推）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因此，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主要措施是：从制度上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推行计划生育，缩小家庭规模，改变社会结构，鼓励节俭消费，倡导居民储蓄，培养企业家精神；改变收入分配格局，避免公平伦理观念影响效率原则，并促使财富向投资者集中；依靠国家综合投资以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规划的确定，加大突破陷阱的力量；吸引外资以增大投资和收入；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

（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该理论是 1953 年由美国经济学家 R·纳克斯（R·Nu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的。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完成一个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又完成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使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出现。

2.1.2 平衡增长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拉格那·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一书中提出平衡增长理论。他主张在各个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了两种基本的恶性循环, 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 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 而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 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 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 从而提高需求弹性, 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 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通过供给(投资)创造需求, 以及供给函数的不可分性和市场的不可分性, 是平衡增长战略在理论上的支柱; 另外, 它还突出地体现了对社会分摊资本的节约以及社会各部门间劳动分工的发展、垂直和水平联系的加强。这些都是走向良性循环的条件。

为了说明缺乏平衡增长所产生的后果, 可以设想这么一个国家, 其经济增长是从建立一个工厂起步的。工厂建立起来了, 并生产出鞋子。问题是如何全面顺利地卖掉鞋子。这家工厂的工人本身用他们增加的收入去购买工厂生产的新鞋没有问题, 然而, 对于该工厂以外其他人口来说, 由于他们的收入并未增加, 因而买不起工厂生产的鞋子, 只好仍旧穿自制的鞋子。于是, 鞋厂因无法卖掉鞋子而破产, 促使经济发展起步的努力也因此以失败告终。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就是同时开办一系列的工厂。如果在发展鞋厂的同时, 又建立纺织厂、面粉厂、自行车厂和其它许多部门的工厂, 鞋厂就可以把它的产品卖给这些厂的工人, 鞋厂的工人也可以用他们得来的收入去购买自行车、面粉和衣料, 因而也使其它新工厂有了偿付能力。这一类发展模式有时被称作为需求方面的平衡增长, 因为工业的发展取决于消费者(以及投资者)的需求模式或者说消费模式。供给方面的平衡增长, 指的是需要同时建立一系列工厂以防止供给短缺的出现。因此, 在筹建一个

钢铁厂时，计划人员应把握住同时具有煤矿、铁矿和焦炭生产等设施的条件下，除非这些投入品都可以从进口获得。从更加整体化平衡的角度看，不仅工业内部发展要平衡，而且还要保持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平衡，否则，两个部门之间的贸易条件就会急剧地不利于工业，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终止。

2.1.3 大推进理论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 (P.N. Rosenstein-rodan) 是该理论的倡导者和集大成者。^①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众多产业，从而突破其发展瓶颈，推进经济全面高速增长。大推进理论的论据和理论基础建立在三个“不可分性”上面：

(1) 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

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资金系数 K 的值越小，则收益越大；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投入产出过程的不可分性能够增加收益，并对提高资金产出比作用甚大。在基础设施的供给方面“社会分摊资本”就具有明显的过程上的不可分性和时序上的不可逆性。诸如电力、运输、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且必须先于直接生产性投资；由于其资本形成的特点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持久性，一旦形成规模和能力，要改变这种资本存量结构就比较困难；这种具有公用性产业性质的资本形成还具有不能再缩小的最小规模组合的特点，这是它促进外部经济产生的前提，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瓶颈”，只不过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表现为资本的短缺。

(2) 需求的不可分性

没有关联产业的互补效果，则不确定性和市场销售的困难将使单个投资项目具有较大风险。众多关联产业在投资决策中实际上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彼此都在为对方提供着要素投入的能力和市场需求市场的容量，从而共同突破市场瓶颈，形成了市场需求

在不可分性之中的互补性，从而降低了市场风险，增加了投资刺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不同产业的资源配置在一定空间，同时具有一定规模。

(3) 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

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人均国民收入非常低，因而居民储蓄相应低下；另一方面，即使最小的投资规模也需要大量储蓄。打破这个“储蓄缺口”的惟一办法，是在投资额提高诱发的居民收入增长时，必须使边际储蓄率高于平均储蓄率，否则，储蓄的不充分将使投资规模受到局限。

2.1.4 对平衡增长理论的简评

自平衡增长理论面世以来，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作出过评价，不管是毁是誉，该理论已载入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史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不想重复经济学家们的各种评价，只想从本书论题出发，谈一谈笔者的观点。

毫无疑问，在满足一定条件（如储蓄和资本来源足够大；国家间和地区间没有或欠发达的分工和交换）的前提下，平衡增长理论是成立的，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填平“低水平均衡陷阱”、改善“瓶颈”制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和治病良方。

但是，如果在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理论之间作出选择，笔者倾向于后者。

首先，在实践中难以找到平衡增长战略的成功案例作为支持。

其次，拉哥那·纳克斯认为，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理论上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工业同时投资，显然需要在短期内筹集无比巨大的一笔资金，但这

笔资金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因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也低，因此靠自身无法在短期内筹集到“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所需要的数额。寻求国外支持如何？这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突破口。然而，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提供支持以及支持的力度是否足够大都难以保证，况且提供支持后随之而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令人畏惧。所以，就如同医学界认为的那样，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物质可以杀死癌细胞，一旦找到，癌症就会像普通疾病一样被治愈，尽管理论上是对的，但我们迄今还无法找到这种物质。

第三，大推进理论建立在三个“不可分性”的论据基础之上，即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在实践中，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可分趋势。例如，某种复杂产品的生产过程或部件可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之间共同完成，这种可分性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诚然，在基础设施的供给方面，社会分摊资本确实具有明显的过程上的不可分性和时序上的不可逆性，但对加工业的可分性束缚作用不大，加工业的可分性照样进行。当然，多产业形成的足够大的加工规模利于“社会分摊资本”，但少数优势产业形成的足够大的加工规模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未必需要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这种“大推进”，集中投资于少数工业领域也未尝不可。

不可分性是确实存在的，再生产过程的比例性也是客观要求。但这种不可分性和比例性未必拘泥于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范围内，在现代技术经济条件下，完全可以在跨地区、跨国家的条件下实现其不可分性和比例性。也许，平衡增长理论是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封闭的状态之下，并且忽略了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

第四，按照平衡增长、全面推进的理论发展经济，将会出现

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全面推进，将意味着各个产业效率上的良莠不齐，高效率产业比重不是很大，相对优势产业地位不够突出，低效率产业大量存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与此同时，尽管各个产业的平衡增长、全面推进不是齐头并进，速度划一，但也势必造成各个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是相对稳定的。当这种稳定的结构状态是一种理想的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时，倒是我们要追求和保持的。但如果是一种低效率的结构状态，这种由于平衡增长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缓慢变化必然阻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丧失掉结构优化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关于这种效益，在下一章将详细展开。

2.2 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

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又称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这种理论与平衡发展理论相对立。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或某一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它资源，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或区域进行，其他部门或地区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或区域的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

2.2.1 赫尔希曼和汉斯·辛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汉斯·辛格在其《国际发展·成长与转变》一书中批评平衡发展理论说：“平衡增长理论主张工农并重，忽视了经济发展的主旨在于将人力从低生产力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较高的工业部门，工业发展固然有赖于农业的协助，但尽管如此，经济发展仍然要完成转移人力使用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平衡增长战略无能为力。”辛格认为，平衡增长不是从起步开始，而是从过去的结果之处开始。如果过去的发展并非均衡地发展，为了使失去的均衡逐渐恢复，则有必要采取不平衡的战略。当我们比较一国经济

在不同时期的成就，也许会发现各方面都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事实上在整个过程的某一个短暂的期间，经济内各个部门的发展速度并不相同。整个经济发展在这段时间内，通常是由少数发展带动的。从长期考察各方面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辛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艾伯特·赫尔希曼 (A.O.Hirschman) 的热烈支持。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主要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认识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 and 战略。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若实行一揽子投资，则资本稀缺这一瓶颈无法突破，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平衡增长。他指出，发展的路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从一个企业通向另一个企业。经济发展通常采取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一种不平衡走向新的不平衡。因此，发展政策的任务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赫尔希曼指出，一般来说，新的投资工程上马时它总要利用以前的工程创造外部经济，同时它自己也创造能被以后的工程利用的新的外部经济。但投资工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外部经济利用多创造少的具有收敛级数性质的投资，另一类是对外部经济利用少创造多的具有发散级数特性的投资。发展政策当然要鼓励、促进利用少创造多的发散性投资，但实际状况往往是两类投资交叉进行。

赫尔希曼认为，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与直接生产部门投资具有不同作用：前者为后者创造了外部经济，前者具有发散的性质，后者具有收敛的性质。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使直接生产部门的投资变得节省，从而减少了这些部门的生产成本。但由于社会基础